



胡亚敏／总主编

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丛书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

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主办

李遇春 邱 婕／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亚敏／总主编

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丛书

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主办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

李遇春 邱婕／主编

中师大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 / 李遇春, 邱婕主编. —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9

(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丛书)

ISBN 978-7-5622-7560-2

I. ①从… II. ①李… ②邱… III. ①刘醒龙—小说研究—文集
IV. ①I207.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5647 号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

◎ 李遇春 邱 婕 主编

责任编辑：童 雯	责任校对：肖绪旭	封面设计：胡 灿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426 (发行部)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 press@mail.ccnu.edu.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34	
字数：540 千字	版次：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84.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序

“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丛书”由湖北省人文社会学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简称“批评中心”)组织编撰。作为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参与和推动湖北省的文化建设是“批评中心”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湖北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深厚的革命传统，如今又是教育和文化大省，在文学创作上成绩斐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关注湖北的文学活动，推进湖北文学和文化的健康发展，是出版这套丛书的主要缘由。

关于湖北文学的研究，不少人已做过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的这套丛书将有所拓展，力求从历史和多维的角度对湖北的文学文化活动做深入研究，形成自身的特色。对湖北文学的新发现和再认识是本丛书和“批评中心”的重要任务。在研究对象上，本丛书既注重大家之作，又不偏废对新生代优秀作品的推举；在研究范围上，本丛书所关注的不仅是小说，也包括诗歌和影视剧作，随着文学边界的拓展可能还会进入更为广阔的文学和文化活动领域；就研究角度而言，本丛书既有宏大的政治叙事评论，又有从生态、性别、伦理等角度的切入。同时，我们还发现，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湖北籍作家的创作成就远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本丛书将不囿于湖北某一特定时代的文学活动，而是从当下向历史深处延伸。即将推出的《刘醒龙文学创作 30 年回眸》、《小说林中的动物——李传锋小说研究文集》、《湖北青年作家评论集》、《同时代的人：诗意的见证——湖北诗人诗歌评论集》、《张光年文学研究资料集》正是实施这一设想的部分成果。

毋庸讳言，如今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文坛上批评声音偏弱，批评甚或变成捧场；二是批评理论与文学创作脱

节，两者成为不同道上跑的车，各走各的路。改变这种创作和评论的龃龉是本丛书的又一任务。我们的批评将立足创作的大地，细读文本，切实研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问题。同时，本丛书将通过对研究对象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对当下创作的评论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翔实的史料。如《张光年文学研究资料集》就是在张光年家属的全力支持下对其文学活动的全面整理，其间获得了一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包括部分未公开发表的重要佚文。《小说林中的动物——李传锋小说研究文集》则附有作家生平、作品、评论、年谱等。这些资料为将来湖北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本丛书不是材料的堆砌，追求理论的先导性和深刻性是它的又一目标。我们力求在从容的分析和阐述中表达出一定的学术见地，展示中国学人的思想与智慧。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关系，古罗马文学批评家贺拉斯曾打过一个比喻，他把文学创作比作“刀子”，把文学批评比作“磨刀石”，“磨刀石”虽然“自己切不动什么”，但却“能使钢刀更加锋利”。这里，我们也将本丛书的编撰定位为“磨刀石”，希望通过批评的切磋，使湖北的文学创作这把钢刀更加闪亮。

经过近 30 年的建设，“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已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研究人才，其中既有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又有国内崭露头角的小说评论新锐，并且不乏诗歌评论的专家和戏剧影视研究的学人，可以说“批评中心”具有整体的学术优势。本丛书的编写者主要是“批评中心”的研究人员，他们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又共同关注湖北的文学创作和研究。通过这套丛书的编撰，“批评中心”不仅实现了多学科的交融和合作，而且通过“文学批评”这个与中国当代社会有密切联系的领域，将高校的文学批评与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联系起来。参与湖北乃至中国的文化建设，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本丛书即将面世之际，我们要感谢湖北省委宣传部和湖北省作家协会的大力支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鼎力相助，感谢各位编辑的辛勤劳动。我们特别要感谢的是出版社社长范军，这套丛书正是在他的商议中孕育的，他以专业精神和学术眼光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最后我们要感谢的是“批评中心”的同仁，本丛书的编写浸透了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是他们的不懈努力使本有点散淡的我决心来做这套

丛书。当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书中的瑕疵有待进一步完善。

湖北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人才辈出，我辈当格外珍视。相信湖北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强强联手将会推动湖北文学走向新的繁荣！衷心希望湖北的作家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苍生的好作品来！

胡亚敏

2016年2月10日

前　　言

关于刘醒龙，最先引起读者注意的是他的“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鄂东大山里的风俗人情、奇幻故事以一种诡谲多变的寓言形态得以呈现。毫无疑问，年轻的刘醒龙在 1980 年代以自己独特的书写为当时的中国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且有激情的艺术血液。但刘醒龙是一个善于给人惊喜的作家，当读者以为刘醒龙会在大别山的神秘中继续流连忘返之时，他却凭借着强烈的艺术自觉意识完成了创作的转型，在 1990 年代推出一系列直面现实的力作。反映民办教师命运的中篇小说《凤凰琴》便是其中的扛鼎之作。1994 年，《凤凰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上映，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人们开始意识到，在中国大地上，还有一群默默耕耘的教育者被遗忘，他们以萤火之光照亮着贫瘠的中国乡村。面对随之而来的称誉与褒扬，刘醒龙既未显浮躁之态，亦不露停滞之象。在《凤凰琴》的基础上，他十七年磨一剑，于 2009 年推出长篇小说《天行者》，小说分为“凤凰琴”、“雪笛”、“天行者”三个部分，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从《凤凰琴》到《天行者》，是刘醒龙以高贵的人文精神理想为“20 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民办教师”所谱写的一曲生命赞歌。

新时期以来，中国经历了较为繁多的改革与新变。体制约束与自由主张并存，这种充满悖论的语境衍生出同而有异的命运共生群体。一代人的命运在各自的差异性中，又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民办教师便是命运共生群体中的一脉。事实上，民办教师是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个特殊群体，是中国独有的一类知识分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是重点发展的地理区位，大量的教育资源集中于此。相较而言，农村中的知识力量略显薄弱。民办教师应运而生，为农

村教育事业垫起基石。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历经坎坷与风雨，耕耘于广袤的农村大地。上个世纪末，义务教育体制逐步走向正规，民办教师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正逐渐消逝在历史的夹缝中。在被需要的时候熠熠发光，在时过境迁之时悄悄隐没，民办教师的个人命运在政策嬗变中辗转浮沉，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宿命感与荒谬感。时至今日，民办教师似乎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名词，渐渐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化而出，但是这样一代人的身份标签以及存在意义却不能被轻易抹去。刘醒龙将目光投向这一群体，他以文字拒绝遗忘，并试图挖掘这个历史群体独有的鲜活记忆与存在意义。在一次接受采访时， he说道：“这个时代太容易遗忘了。好像不丢掉历史，就没有未来。其实正好相反，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我觉得，对于为中国当代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的乡村知识分子，历史是欠他们的。而我们不能欠，不能遗忘。所以我用笔来写他们，让后人铭记他们的存在，我觉得这是一种起码的态度。”

刘醒龙对民办教师的铭记，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一个行将就木的历史名词的反复书写与描摹上。民办教师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产物，他们的命运沉浮与生命体验具有不可复制的特质。刘醒龙试图在行进的历史中对民办教师进行铭记。1992年，小说《凤凰琴》发表后，不少读者来信希望刘醒龙能够写出续篇，但是他保持了缄默。直至十七年后，刘醒龙才推出《凤凰琴》的续篇《天行者》。我们不妨将刘醒龙的这种创作姿态称为动态写作。追踪式的叙写方式跟进历史，回归文学现场，从而将民办教师的命运脉络进行如实的展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刘醒龙笔下的民办教师故事与历史中的民办教师生活具有同构共存的关系。这种动态“全景”格局下的文学书写，使《凤凰琴》与《天行者》具备了知识考古学的写作脉络。从《凤凰琴》到《天行者》，我们不仅能读出行进中的历史形态，还能还原出民办教师的命运路径。刘醒龙虽然选择直面现实与历史，但却拒绝平庸与世俗，他渴望用文学改变社会世俗形态。《凤凰琴》发表之后，民办教师的问题受到全社会的重视。一直被“边缘化”的民办教师逐渐获得应有的待遇与名分。之后的十余年间，也就是《天行者》的重构之时，民办教师面临着新的生活际遇与问题，支教生和编外代课教师的涌现再次牵引着刘醒龙的艺术思绪。不难看出，刘醒龙在书写中选择的

切入点都是民办教师群体经历剧变的关键节点。体制的变迁、身份的重构、精神的困境，民办教师们的遭遇与生活在刘醒龙的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从《凤凰琴》到《天行者》，这是刘醒龙“以小见大”，将鄂东界岭高地作为承载对象，为中国乡村知识分子——民办教师的生活和心灵世界创作的一部风云志。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既是对历史与现实的书写，也是对被遗忘之时光的回溯。刘醒龙在对“史”的书写中融入了一个作家的当下之“思”，他在小说创作中试图完成当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艺术诉求。所谓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即知识分子对自身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自我体认。知识分子的身份标识具有明显的精神性特征，他们以此为荣，并自觉自愿地承担起寻找人类精神家园的使命。从 1980 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知识分子遭遇了新一轮的身份认同危机。身为知识分子的文学家，自然首当其冲。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通过“伤痕”、“反思”、“改革”等现实主义创作热潮，以强烈的社会参与姿态重回公众的视野；但是，由于不满于文学固步在传统现实主义形态之中，一批新锐文学家开始了新一轮的艺术探索，文学观念、价值取向、手法技巧等都经历了一场裂变。这种由内及外的新变举措虽然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话语空间，但是，匆忙而又繁复的改变却使中国文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知道自己来自何方，却不知自己终究要去向何处。创作上的焦虑引发了作家们的惶惑不安。除却文学内部的变革焦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也造成了文学家身份认同的危机。文学世俗化思潮的日渐得势，通俗文学大行其道，对纯文学造成了极大冲击。文学家在物质、金钱和权力的挤压下成为“边缘化”的存在。文学逐渐退却之前的热度，从公共话语空间中向内回缩，走向个人化、日常化、世俗化。纯文学对“五四”精神的承续热度逐渐降温，启蒙与批判之精神面临失语的困境。文学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遭受来自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质疑。

身份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含混性造成了知识分子的欲自我定位而不能的迷茫心态。在这种精神焦虑与意义缺失的语境下，知识分子重新展开对其身份认同的诉求。《上海文学》1993 年第 6 期发表了《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拉开了关于人文精神论争的帷幕。继五四运动之后，这是又一次重塑文学意义的盛宴。这次论争虽然

不以知识分子身份的重新认同为主题，却也与之有着密切关系。然而，刘醒龙进行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努力是在这场论争之前。《凤凰琴》发表于1992年，纯文学已然进入一个意义含混的时代。刘醒龙敏锐地察觉到身份认同的缺失，他大胆地以自己的创作行动重建知识分子身份的高原。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刘醒龙在为笔下民办教师进行乡村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同时，也在凭借着强烈的艺术自觉意识进行知识分子自我身份认同与艺术建构。在刘醒龙看来，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延续性的历史过程。他认为，无论是作为作家的自己，或者是他笔下的民办教师，责任与坚守、爱与善、批判与救赎都是具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中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

实际上，刘醒龙笔下的乡村知识分子大多是成长型的人物，用善与恶对他们进行评判未免显得过于简单。刘醒龙以现代文学观念打破了古典化的二元对立模式，使得笔下的人物形象构造充满着悖论与张力。张英才这个线索人物，在成为民办教师之前，坚信班主任老师的口头禅“死在城市的下水道里，也胜过活在界岭的清泉边”说得很精辟，以至于站在家门口抬头往界岭方向看一眼都觉得很累。骆雨进入界岭小学的原因亦显得不怎么纯粹，跟母校签订的协议使得他起初将界岭小学当作个人的“秀场”。夏雪因为感情的纠葛，选择界岭当作自己逃避的圣地。刘醒龙乐于将自己的英雄们置于不甘却又无可奈何的境地，他不在意自己笔下的民办教师着重于世俗和功利的思想起点，他着力展现界岭小学的这些“天行者”在原本的身份存在与民办教师身份之间的纠缠。刘醒龙笔下的乡村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过程无疑充满着阵痛，却又因疼痛而充满力量。转正已然脱离一个直陈其事的概念范畴，成为一种隐喻性的存在。在对转正极度渴望却不能得的临界点上，民办教师们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认同。责任与承担让辗转流离的灵魂在这渴望而不能得的困境中找到了皈依。这是一种被“吊”着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被悬置或弃置的叙事模式。在被“吊”着的过程中，他们以星星之火燎燃起中国乡村的教育之火，以自己并不宽厚的脊梁为中国农村孩子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民办教师群体的存在一度成为乡村荒漠的盏盏明灯。他们学会了人格的坚守、对磨难的承受，并自觉地扛起对学生和这片大地的责任。

责任与承担，不仅是刘醒龙赋予笔下乡村知识分子的特质，也是作



家自身所向往的身份认同构成要素。刘醒龙是一个善于给人制造惊喜的作家，但是，在这惊喜的背后，蕴藏着他的清醒的自我认知精神。他自觉承担起重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使命，在世俗、平庸的话语危机中，站立于荒野之上大胆发声。这样的身份认同，无疑充满着浓郁的人文精神，这也是刘醒龙一以贯之的追求与向往。刘醒龙曾说：“1992年我写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心存感动。事隔十几年，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充满感恩。因为，我看得见，如果没有那些可以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的哺育，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从感动到感恩，刘醒龙与笔下的人物一起成长。

无论是《凤凰琴》还是《天行者》，文本中都弥漫着一种朝圣般的宗教气息。万站长对张英才说：“想说界岭小学是一座会显灵的大庙，又不太合适，可它总是让人放心不下，隔一阵就想着要去朝拜一番。你要小心，那地方、那几个人，是会让你中毒和上瘾的！你这样子只怕已经是沾上了。就像我，这辈子都会被缠得死死的，日日夜夜脱不了身。”这种朝圣心态的形成是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感逐渐觉醒的标识。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为了转正费尽心力，人性的小恶尽显无疑；但是，民办教师们的美却体现在将转正转变为“转让”这一行为，这不是简单的对古老中国儒家“谦让”伦理的照搬照抄，而是注入了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觉醒的精神血液，虽然难免有理想化之讥，却是他们最终寻得皈依之所的明证。乡村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只有受到爱与善的滋养，才能摆脱游移不定的存在状态。在进行自我身份认同时，刘醒龙丝毫不避讳自己所占领的道德高地。在接受采访时，他称：“日常社会不能没有伦理，伦理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基础、一种起码的要求，它是法律所不可替代的。我相信善，相信爱，相信善和爱是不可战胜的，是最有力量的。”善与爱，不仅是界岭小学乡村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的重要构成，更是刘醒龙完成自我身份认同的决定性因素。

众所周知，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各种文体试验层出不穷，给原本肃净的文坛增添了较为多彩的乐章。原本居于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在色彩缤纷的现代主义技巧下相形见绌。坚持新变的新潮作家将现实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认为其是阻碍文学进化的罪魁祸首。刘醒龙却选择了回退

的写作姿态，坚定不移地捍卫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刘醒龙对民办教师这一群体是极为尊重的，源自骨血的尊重使得他下笔极为慎重。无论《凤凰琴》还是之后的《天行者》都呈现出固执却有力度的现实主义艺术形态。他以自己的现实之笔完成了对炫技式书写的个人阻断，也意图凭借此重新拾起知识分子应怀有的善与爱、应肩负起的道义与责任，进而完成重建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诉求；但是，刘醒龙笔下的现实主义并非是简单的艺术回归，他的作品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往往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生命之上，诗意漫天，是他一以贯之的艺术坚守。就在这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缭绕而成的文本话语中，刘醒龙突破身份恍惚的困境，对笔下人物和自我之身份认同进行双向互动的修补与弥合，寻找知识分子的道德高地。追根究底，无论是《凤凰琴》还是《天行者》，都是作者吟诵而出的关于扎根乡村之教育者的生命赞歌。里面的人物，像一株株努力生长的植物，往往在夜深人静之时，发出拔节的清亮之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刘醒龙不顾漫天风沙，携带着自己的人杰与鬼雄，铿锵前行，将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

毫无疑问，刘醒龙及其《凤凰琴》与《天行者》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热点话题。《从〈凤凰琴〉到〈天行者〉》这本集子把近 20 年来期刊报纸上有关两部作品的相关评论文章进行了整体性搜集与展示，以期钩沉出有关二者之研究的发展脉络与整体面貌。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有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刘醒龙笔下的民办教师艺术群像，也对评论界更深一步地研究刘醒龙的文学思想和艺术坚守有着启示意义。下面对本书的编选原则做一些说明。

首先是批评的深度。1980 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理论方法一窝蜂地涌人中国。不能否认，西方文论的涌人给中国文学批评界带来了新的视界，它凭借新颖的观点、系统的说理、严密的逻辑成为备受推崇的对象。运用西方理论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流行趋势。在文学批评中运用一种乃至几种西方文论成为文章有深度的体现。但是，随着时代的演进与发展，对西方文论的借鉴与运用出现了一些偏差：理论运用的多少与深奥程度成为衡量批评深度的尺度，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则沦为彰显与推广某一西方理论的场域。有些文学批评家对西方文论深信不疑，秉承“拿来主义”的原则，举起形式主义、新批评、女性主义、殖民主义等

西方文论的大旗，却几乎没有花什么气力对文学文本进行细读。这样的理论先行往往导致文学批评的“泛对象化”，或者“无对象化”。面对这种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的主观阐释与过度阐释模式，如何走出一条新的重建批评深度的道路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诗、思、史是构建批评深度的三个重要维度。“诗”指文学文本层面。充满诗性的文学批评要求批评家回归文学现场，将文学文本作为探究的本源。文本是文学作品真实存在的形态。加深对文本的理解与感知，并对其进行审美解读是构建深度批评的核心之一。以“诗”写“思”，是文学的特性。“诗”是文本的外在形态，“思”则是对文本内蕴的思考与探究。通过挖掘作家对于社会、人生、存在等的思索，可以有效增加批评的深度。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诗”与“思”并不是浅层与深层的逻辑关系，而是具有一定思想距离的两个平行维度。“史”指对文学作品存在的语境进行研究。从社会层面而言，文学作品的发生总是在一定的现实历史语境之中。这个历史现实是进行文学批评的大背景。任何一个作家和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总是与社会现实语境、文学书写语境等发生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文学批评应该重回历史现场，融汇“史”的眼光，使得孤立的文学批评具有历史的维度，从而构造出深度批评的视野。当然，诗、思、史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并非是必须共存的。若针对其中一维进行单向深入研究，这于深度文学批评而言，仍旧是大有裨益。我们在进行选编时以诗、思、史为衡量标准，所选文章或三者兼备，或向其中一维进行纵向挖掘。

其次是批评的广度。由于本书以《从〈凤凰琴〉到〈天行者〉》为名，因此批评的范围便被辖制在以二者作为关键词与中心语的论述中，自是不能以论说的广度论优劣。这里的广度特指在收编时，我们并没有将眼光完全限制于学术论文，而是将相关报纸短评、关于作家的访问与谈话收录进来，这种广义上的文学批评实践，有助于构建出立体、完整的作品研究体系。

学术论文是本书收编的“重头戏”。文学作品是精神类产物，其审美内涵与特性以一种潜藏的状态存在于文本之中，亟待读者的再解读，从而对其进行填补与充实。这个时候，学术性论文的存在则是将文学作品由物质存在转化为有血有肉的审美对象的关键因素。专业性学术论文的

存在能够使文本价值得到全方位的展现，并且为作家与读者提供相关意见与建议。除此之外，形成规模的学术论文整体能够为文本的经典化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短”、“平”、“快”的写作特点与传播特性使得报纸短评具有自身的优势。报纸评论一般篇幅较为短小。这种特点，使得写作更为自由与灵活，没有过多的形式与规范的限制。“平”指报纸评论的平民化、亲民特性。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以来，快餐文化开始对纯文学进行“攻城略地”。纯文学研究却固守于自身的学术庙堂之中坚守不出。短评类文章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纯文学或学术放下身段，取得更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快”指报纸评论发刊周期短，传播快捷的特点。报纸不同于学术期刊，它具有相当的时效性。在文学话语日趋复杂与繁多的当下，如何使《凤凰琴》与《天行者》之类的纯文学冲破通俗文学和快餐文化的围剿，更为快捷而有效地获取关注目光，报纸短评的出现自然承载了这一使命。

此外，作家刘醒龙针对《凤凰琴》和《天行者》进行的访谈与对话，是具有珍贵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一种主体性的精神生产活动，真正的文学必须具备相当的独创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心理走向、伦理坚持、道德评判对于文本的理解与阐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进行文本评判和阅读的实际证据。因此，将刘醒龙相关访问与谈话予以收录，有助于对其创作心理、人格坚守以及身份认同提供一种直观上的感受与体认。

还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在进行选编时，跳出了小说文本的限制，将关于《凤凰琴》电影的相关论述收录进来。这是因为，自从音像技术开始发展以后，电影与文学成为两个互相绕不开的话题。究竟是电影驮着文学走，还是文学驮着电影走，至今仍旧没有一个确切的论断。《凤凰琴》的小说文本确实是刘醒龙直击现实的力作，但是，根据它改编而来的电影《凤凰琴》更是家喻户晓，获得了比小说更为广泛的媒体关注。同名改编电影与原创小说文本是互文性的共生体。这种互文性的观照视角，打破了二者之间的文类壁垒。这种共存的状态使得关于《凤凰琴》电影的研究成为这本书中不可或缺的比照式存在。

在编选中，我们将全书分为三编：上编为“《凤凰琴》：一曲弦歌动四方”，中编为“《天行者》：远去的精神风景”，下编为“作家刘醒龙谈

《凤凰琴》与《天行者》”。全书所收论文以发表时间为序编排。若遇到同时发表之文章，便以作者的姓氏音序进行先后排列。由于研究《凤凰琴》与《天行者》的论文数量繁多，而我们篇幅有限，所以很遗憾不能将有质量的批评文章进行全盘收录。这本论文集的编选得到了著名作家刘醒龙先生的许可与指导。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尽量与每一位作者取得联系，但是仍旧有部分作者暂时无法联络。这里我们要向所有文章的作者表达我们最诚挚的谢意！

这本专题论文集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胡亚敏教授主编的“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丛书”中的一本，同时也是华中师范大学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的重要成果之一。这里要特别感谢刘醒龙先生和胡亚敏教授对我们的信任！由于本书的编选时间比较仓促，错讹之处在所难免，还盼有缘诸君不吝赐正，以待来日修订。这本书是由我和我的博士生邱婕共同编选完成的。在编选过程中，我的研究生陆为、王欣欣、刘信彤同学在材料搜集与整理方面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009

李遇春 邱 婕
2016年7月末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上编 《凤凰琴》：一曲弦歌动四方**

湖北有个刘醒龙



001

——读《凤凰琴》所想起的 丁帆(003)

大山里的真情



——评中篇小说《凤凰琴》 谈志林(009)

仿佛生活对我们说



——看影片《凤凰琴》 余倩(012)

温馨的悲剧



——评影片《凤凰琴》 刘润为(014)

拨动时代精神的琴弦



——影片《凤凰琴》观后 莫旗(018)

《凤凰琴》座谈



..... 于敏 尹鸿 邵牧君 王得后 周思源 童道明 贾磊磊(021)

以真诚直面崇高



——从《凤凰琴》说起 胡彻(032)

《凤凰琴》的美学追求 普生(034)

假如我写《凤凰琴》



——与《凤》剧作者商榷 李秀春 王灵芝(040)

琴声引起的思索



——看影片《凤凰琴》有感 周俊杰(042)

- 震撼人心的教育诗篇
——《凤凰琴》观后 申志远(045)
- 凤凰琴·国旗
——谈《凤凰琴》道具的运用和场景的渲染 李乃润(048)
- 诚实的与不诚实的
——影片《凤凰琴》观后 彭云(050)
- 走进故事：对人物命运状态的关注和理解
——影片《凤凰琴》何以吸引、打动观众 薛胜利 曲波(052)
- 卑微的、崇高的、生活的、艺术的
——《凤凰琴》的审美解读 管恩森(055)
- 于生活悖理中挖掘和展示社会美
——《凤凰琴》的美学意蕴 刘迅(058)
- 永远的童话
——评影片《凤凰琴》 吴晓东(060)
- 崇高与渺小
——影片《凤凰琴》观后 余一斐(063)
- 从《凤凰琴》说起 杨海波(065)
- 一曲弦歌动四方
——重读《凤凰琴》 於可训(069)
- 心如明镜台
——刘醒龙作品联想 周毅(071)
- 乡村教师的生命赞歌
——读《凤凰琴》 郭大章(081)
- 《凤凰琴》：守望教育 邓志伟(085)
- 大山的守护神
——观电影《凤凰琴》 张琴(097)
- 山村教师的道德救赎
——读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凤凰琴》 姚楠 李遇春(099)
- 一曲深沉的奉献之歌
——评电影《凤凰琴》 王璞琇(101)
- 从《凤凰琴》中探析农村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困境与策略 王凌霞(104)